

統一的基礎

陳之邁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恐怕是近年來和平統一空氣最濃厚的一個月了。在那個月裏，江西的共產老巢收復了，剿匪軍事告了一個大段落；王寵惠孫科兩氏奔走南北，折衝樽俎，帶回來了許多令人興奮的消息；汪蔣兩先生的「感電」拍出了之後，得到很多人的同情；「消除隔閡」，「分工合作」，「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而不取決於武力」，這些原則好像指日可待；四屆五中全會開幕於首都，各中委濟濟一堂，通過了許多頗切實要的議案，對於憲法問題并且提出了一個很合理的原則；最後不要忘了從未出過四川的劉湘居然到了首都，開誠布公的討論四川的財政，軍事和政治改組問題。這種濃厚的統一空氣是值得我們欣喜的。

其實中國當前的問題是很簡單的：「九一八」使我們了解我們險惡的環境，使我們認清我們當前的目標是「救亡圖存」，使我們明瞭「安內」然後才能「攘外」，總之，使我們認清統一的重要。

但怎樣統一呢？「獨立」的讀者一定聽得這是一個最

難解答不過的問題（見本刊第七七至八八號）。胡適之，蔣廷黻，吳景超等先生對於本問題都有很不相同的答案。吳先生根據我國以往的經驗而提倡用武力來統一；蔣先生認定破壞中國統一的是「二等軍閥」，故主張用比「二等軍閥」「更大的武力」，採取「專制」的手段，打倒他們；胡先生對於這種主張頗持異議，而倡議「政治的統一必須建設在平時的維繫全國各部分的相互關係的政治制度之上」。作者不敏，想提出一個我認為比這些更基本問題來供讀者指攷。

統一的局面是向心力比離心力大的局面；促成統一的工作最主要的問題是怎樣使向心力加增而使離心力變小。同時，這種力量是自動而不是強迫的；我們一定要造成一種局面使各地方自動的向心，而不是強迫它們向心。用武力，用專制的手段來造成的統一不是健全的統一，因為它是強迫的局面，往往徒具統一的表面而沒有統一的實際，并且一定潛伏著許多反抗的勢力，遇到武力的方向轉移的時候，便爆發出來，遇到武力衰落的時候則更不必講。

中國以往不是常有武力統一的局面麼？舊時的情形不講，清朝的統一之不健全當爲有目共睹的事實。洪楊之亂，中央簡直一任各省去實行自衛，亂平後也叫各省去自己辦理善後事宜；辛亥革命，各省儼然是獨立的國家。外國的情形亦復如此：革命前的法國，各地方雖然在中央嚴密監督之下，統一仍是很不健全，一瓶酒從南方的波都輸運到巴黎竟要繳納十幾次的過路稅 (Octroi)；俄帝國雖採用最毒辣的專制手段來壓迫邊疆各省，但是到了歐戰開始，便呈現出四分五裂的局面。用武力，用專制的方法在承平時代尙勉強可以維持統一，一到外侮，中央便有裏外夾攻的苦楚。這種的統一即使達到，也絕對不能令人放心去做「救亡圖存」及「攘外」的工作。

用政治制度來謀統一與用武力和專制當然完全不同，但用這個方法所產生的局面仍然只是表面的而不是實際的。一個國家的各部份如果尙沒有感覺到統一的必要，它們即使派幾個代表來參加中央政府的機關，也不能使肯和中央「精誠團結」。中國人沒有遵從多數的精神是因爲不遵從對他們不會發生什麼不良的效果。加之，政治制度——尤其是民治化的政治制度——並沒有改造環境的功能；反之，它是隨著環境走的。隨著環境去適合理想的政治制度

結果只有使政治制度本身崩潰。我國以前會把世界各國的政治制度搬了回來，但它們未曾改造一些我們的情況。關於這層我擬日後再爲文詳論。

蔣廷黻先生嘗說，「毛病不在軍閥，在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蔣先生所謂「意態」是省界觀念，他所謂「物質狀況」是貧窮。胡適之先生嘗引這句話，但他所說的「意態」是指「中國思想界的種種衝突矛盾的社會政治潮流」，而他所說的「物質狀況」是指「中國疆域之大，和交通之不便」。

我也覺得「毛病不在軍閥」，有了適合軍閥的環境才能有軍閥。時勢可以造二三等的英雄，唯頭號的英雄才能造時勢，而我們所有的軍閥都是些二三等以下的英雄。我也贊成毛病在「意態」和「物質狀況」，但是我覺得在蔣胡兩先生所舉的「物質狀況」以下，尙有最基本的「物質狀況」，這個狀況同時并且是支配「意態」很重要的勢力，亦即造成向心力很重要的勢力。這個狀況是現代經濟制度的發展。

這個發展是消弭隔閡，聯絡各地方，及產生向心力最基本的力量。在它未發展到相當程度以前，用「武力」也許能得統一，用「專制」也許能得統一，用政治制度也許能得

統一，但所得到的結果決不能使我們「救亡圖存」，更不能使我們狠有把握的「撲外」，「收復失地」則更不用夢想。蘇俄爲什麼在氣餒正盛的時候把托洛斯基趕了出去而一心一意的去實行五年計劃，正是看透此層。他們的頭腦比我們清楚，雖則他們的主義我們不敢苟同。蘇俄爲什麼在高唱世界革命的時候沒有什麼人理它，而第一次五年計劃成功後忽然惹起了世人的注意，這正是這種政策的成功。

現代經濟制度的發展之足以促成統一，是顯而易見的。在它不發達的時候，社會正如一盤散沙，各地方可以各自爲政，閉關自守，過它們自給自足的生活，甚至於採用封建政策，實施所謂「統制經濟」的「模範省」。一般的小民，本來渴望著得片刻的太平來過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自給自足生活，根本想不到他們與外界的關係，自然也謳歌這種政策。因此在現代經濟未發達的國家裏，即使有最雄厚的武力，最整齊的專制，最高明的中央政制，地方色彩總是非常濃厚的，離心力總是非常之大的。

但是在現代經濟制度相當發達以後，情形便大不同。現代經濟制度是分工的制度，因爲分工所以整個經濟制度的各部份都有最密切的連鎖，它們不顧政治的區域，它們是超越政治區域的。最近數年，少數經濟發達的國家裏的

生產事業，發生了恐慌，結果釀成全國的不景氣，甚至於牽連到全世界，連我們中國都不能倖免。這種經濟的連鎖現在不但超越了一國裏的政治區域，並且超越了國界，不過國際的政治現在尙死守著前此狹隘的觀念而拒絕承認或公然的否認明顯的事實而已。我們所要注意的是一國裏現代經濟的發展是那國統一最主要的基礎，因爲它能把歷史遺留下來地方區域的單位性抹殺。而把各部份聯絡起來成一個整體。

西方國家的統一史裏有很多證明此點的例子。本文上面說過早年歐洲所謂統一的國家其實并不見得是我們理想的統一，我國以往的統一局面也并不滿足我們的希望。德國從前曾四分五裂爲二百多個獨立的國家，十九世紀初年減至五十多個，中葉時尙有三十多個。一八三三年有「關稅同盟」的組織，加入的都是北方的國家；一八六七年又有「北德意志邦聯」的組織，顯名思義也是屬於北方的。到了一八七一年南方的國家才用條約狠遲疑的加入，并保留了許多獨立的色彩。北方的國家之所以毅然的聯合起來，而南方的所以不狠熱心，雖有許多原因，但其主要的還是北方諸國現代經濟的發展使它們感覺到連合的必要，而南方諸國之模稜態度表現它們經濟發展的落後。

美國早年各邦門戶之見之深是著名的。十九世紀中葉這種意見竟釀成空前的內戰。但是在現代經濟制度充分發達以後，這種門戶之見已漸消滅。美國早年各邦對於聯邦政府都懷一種恐慌的心理，竭力保障各邦的權利不被聯邦侵蝕。自大規模工商業發達以後，跨邦以至於普及全國的組織甚多，聯邦政府因有權統制邦際貿易，勢力也一天天膨脹起來。熟悉美國史的人都知道，最主張增加聯邦政府勢力的人和政黨都是經營工商及其副業的，而呼籲邦權論的都是經營農業的。代表前者的共和黨所以在內戰後一躍而長期把持政府，正足以反映美國經濟的變遷及其對於政治的影響。

加之，在經濟不發達的國家裏一個普遍的現象是蔣廷黻先生之所謂貧窮，貧窮很明顯地是釀成內亂的一個主要原因。衣食住行四種基本需要時常發生劇烈問題的人不是擁護現行制度有力的份子；比較豐衣足食的人民是富有吶喊望治心的。我們不去設法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而用武力或專制的手段去強迫他們服從守法，那是捨本求末的政策。其實早年的軍閥，今日的共匪之所以能擾亂國家都是因為我國有可以被他們利用的貧民，減少這些貧民的數

目正是消滅他們勢力的淵源。

雖然，我們不能不承認，除了上面所指出的這一點以外，尚有許多胡適之先生所謂「歷史上的維繫」，如歷史，文化，語言，文字等等，和「新興的統一勢力」，如普及教育，銷行全國的大報紙，民族國家觀念，及交通機關。但是我認為它們都不是最根本的勢力，何況它們的發達又都是在現代經濟最發達的國家裏才找得到的呢？

以上所述，并非說我們不渴望統一早日完成，也不是勸人不去努力促成統一，我們不過是想提醒現代化的統一，能副我們期望的統一，能「救亡圖存」，「攘外」的統一，是要建築在穩固的基礎上的，亦即建築在現代化的經濟制度上的。現代國家統一的基礎都是最穩固的，我們沒有那種基礎，使不能同它們并肩而立。現在我們政府很努力於生產的建設，本州也曾屢次鼓吹現代工業的發展，這是奠定統一基礎的工作。在這種工作未到相當程度以前，我們的希望不可太奢，失望才不致於太大；在這種工作成全以後，統一局面不愁它不來。

二十三，十二，二十七，

學術與救國

顧毓琇

六

在遠東危機日益緊迫的時候，學術界的人們難道不應該注意到救國的重大責任麼？從九一八以來，他們努力過些什麼？從一九三五年起，他們還是袖手旁觀呢？還是要具體地做一些救國的工作呢？這種情緒，在這一年容易，國難依然的年頭，似乎都在緊張着。最近胡適之先生在本刊第一三二期發表的「國際危機的逼近」，大聲疾呼地指出這個危機的嚴重性來，很可以代表這共有的憂國情緒的流露。

從九一八以來，起初是磨擦擦掌義忿填胸一派緊張的愛國熱心。當時的呼聲是「甯為玉碎，毋為瓦全」。逐漸冷靜了，學術救國的口號彌漫了全國，甚至「甯為瓦全，毋為玉碎」的新說，亦得到了一部分知識界的提倡了。國內的學者同大學教授們，亦聊以自慰地繼續起學術研究的工作來。既然舉國上下都在提倡學術救國，那麼他們從事於學術的工作，豈非便是擔任了救國的工作麼？至於他們的學術，如何可以救國，那就好像不在他們研究的範圍以內。青年的同學們呢？他們雖然亦勉強鎮靜沉着了，但是這

些「血氣方剛」的青年，終還嫌學校的課程空洞而不切要。老實說，他們在懷疑學術怎樣可以救國，他們在懷疑他們的教授們能否擔任救國的工作！

我們平心靜氣想，我們的學術界近年確是有進步的。胡適之先生這樣說，翁文灝先生亦這樣說。中國學術界這樣說，外國學術界亦相當承認。

最近諾貝爾科學榮譽獎金的承受者郎穆爾博士由日本來到中國。在北平學術界的歡迎席上，他稱讚中國科學家，說他們已經在做着「基本研究」的工作——這些工作日本人還沒有注意到，他們過於看重忠君愛國了。

我認爲郎穆爾博士的話，最足以指出中國和日本的學術界的不同來。他們學術界努力的方向是爲着國家的前途；我們學術界努力的方向，乃是爲着學術的前途。平心而論，我們爲學術而提倡學術，研究學術，乃是高人一等的，倘若我們不把學術同救國混爲一談。

研究學術，乃是人類知識的探險。哲學如此，文學如此，科學亦如此。政治學如此，社會學如此，工程學亦未

嘗不如此。純粹學者的態度是無所求於世的，但亦絕不計較功利觀念的。倘若別人批評他的學問無用，他只覺得好笑，並不覺得是一種輕視。這不僅文學哲學如此，科學亦未嘗不如此。政治學者，社會學者，工程學者，實際政治家，社會事業家，工程師所抱的目標，並不完全相同，這亦是人所共知的。

學術的本身是高貴的，無所爲的。所以對於一個純粹學者的工作，我們只應該表示欽佩，而不定要把救國的責任放在他們肩上，因為學術工作所需要的乃是理智的超然性。

但是學術本身並不是自私的，他不反對被人利用（倘若可以利用的話），雖然他的目的不在利用。自然科學的利用，科學家從來不反對，便是一個最好的證明。他們一有科學上新的發現，便公諸世人，誰願意利用就利用。又如社會科學研究的結果，亦是可供政治家財政家實業家利用的，而學者們誰亦不致於吝惜的。

這樣說來，學術救國乃是間接的。學術的本身並不爲着救國，亦並不便可以救國。學術研究的一部分結果，如有適當的人去利用，對於救國的工作方始可以有直接的貢獻。

現在我們前面有三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一) 學術研究的結果既然只有一部分可以利用，我們在國難時期，對於學術研究的範圍，是否要加以選擇呢？

(二) 學術研究已有的結果，我們應否充分利用呢？

(三) 利用學術研究的結果，誰是適當的人呢？

對於第一個問題的解答，很有相當的困難。因為在沒有得到適當的利用以前，一切學術研究的結果，自然都是無用的，所以無從選擇起。但是，我們如從國家社會現實問題做出發點，去推求這些問題相關的學術方面，那麼研究的着重點便容易有適當的範圍。例如，我們研究農村組織，而以中國的農村問題爲出發點，那麼我們雖不妨研究歐美以及印度朝鮮的農村，但是我們注意的目光會引我們着重於某一部分的材料。否則一個人儘可以做一篇十萬字的歐美農村概況，而其中選材方面，或者我國所最要參攷的幾點，反而簡略了。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想大家都主張要利用的。怎樣利用，乃與第一第二兩個問題有連帶關係的。因爲要利用研究的結果，以解決實際的問題，我們就會發現許多研究的結果是不合宜或是不完備，雖然研究的本身，在學術上或

者很有貢獻。

誰去利用學術？這個問題有兩方面：第一方面是誰想利用學術；第二方面是誰能利用學術。想利用學術的人一向是很多的，雖然想利用的人不一定能利用。就以目前而論，「專家政治」的主張漸漸見諸實行。政府的當局要勵精圖治就想利用學術，那確是一種好現象，誰亦不反對的。但是誰纔真能利用學術呢？我以為惟有藝術家——對於學術有根柢的人——乃能充分利用學術。

以自然科學而論，倘若一個人沒有科學的訓練，科學的了解，他便不會利用科學。其他學術，亦何嘗不然。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在位的人倘若沒有充分基礎，

鄉村人口問題

巫寶三

誠如梁漱溟先生所說，鄉村建設是國民革命後的一個大運動，可是領導這個運動的人是否把鄉村中的幾個主要問題把握住了呢？在我看來，他們至少是忽視了鄉村人口這一個問題。

我們縱觀鄉村建設運動的幾個大本營的定縣，鄒平，無錫，徐公橋，在他們的工作綱領裏，找不出他們對於鄉

利用起來，恐怕是隔膜的。他們至少要請不少專家去幫助治理，纔可以收利用學術的效果。

總結起來說：

- (一) 學術的本身並不爲着救國，亦並不便可以救國。
- (二) 學術要是可以救國，那在乎人的利用。
- (三) 藝術家是否能夠擔負救國的責任，乃在乎個人自擇。

(四) 國家應該利用學術，但是要有藝術家去利用，纔可以收效。

二十三，十二，二九。

村人口問題所取的態度，以及進行解決的辦法。定縣可以說是有一丁點兒的表現，他們的縣保健院中附設有一個指導節制生育的部分，可是這個部分並沒有受到他們的重視，他們沒有對這個問題做過廣大的宣傳，也沒有準備對這個問題做如何大的努力，只是附設着聊備諮詢而已。倒是陶知行先生在他提倡的鄉村工學團中把這鄉村人口問題很

鮮明的提出了。在鄉村工學團宣言裏，他主張對整個民族實施六大訓練，其中之一，就是普遍的生育限制訓練，這不能不說是獨具隻眼。

在定縣鄉村工作討論會裏我聽到河南內鄉一位代表報告，他很質朴的把他的工作感念說了出來。他說，他們在內鄉打土匪，辦自治，栽樹造林，修治水利，辦合作社，以至於清丈土地，整理稅捐，這樣幹了幾年，也可以說是做到境內盜匪絕跡，夜不閉戶的境地，（這些報告是很可信的），但是回頭看看老百姓的生活，依然是窮苦！依然是沒有辦法！這些話出自一個實際鄉村工作多年的人，是如何發人深思啊！人民生活程度的升降，要用精密的統計方法才能夠指出，從表面去看，本來是很難給我們一個具體答案的，內鄉這位代表的報告，也許免不了這個毛病。但是我深信建設鄉村的工作，如果單單從普及教育，增進農產等方面着手，而忽視鄉村人口問題的解決，縱然能提高人民生活程度少許，也不能提高到最低生活程度以上，遲早會發生內鄉這位代表同樣的感念的。

我們老來往於這個人口繁密的國家裏，也許不容易覺察我們國家的人口問題的嚴重，但是有見識的外國人到了中國，最使他們觸目驚心的就是中國人口的多與土地利用

的精細。我們只要看看 R. H. Tawney, Sir Arthur Salter W. H. Malory, C. B. Malone, J. B. Taylor, G. B. Cressey, J. Thorp 等人所做的關於論中國的書或報告，就可以知道了。

照 Cressey 在「中國的地理基礎裏所稱農業的中國」，每方英里有三百二十六人，華北平原每方英里有六百四十七人，揚子江流域有些地方人口密度每方英里有二千人以上。這後面兩個區域的人口密度，比較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比利時美國日本都高得很多，每方英里三百二十六人這個數字，是比較比，英，日三國低，但是人家是工業程度很高的國家，我們要是以農業人口密度和他們比，中國又比他們高了，據 C. B. Malone J. B. Taylor 所著「中國農村經濟的研究」上說，浙江鄞縣每方英里耕地有四千六百五十人，江蘇儀徵一千七百七十人，山東濰化三千人，河北遵化二千人。這裏所舉的都是農業人口密度最高的，當然其他地方不會全像上面這幾個地方一樣，但這個高的人口密度也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高的了。以農業人口高密度著名的印度與日本，也沒有中國這樣高。印度農業人口最密的地方是 Punjab，但是那裏每方英里耕地只有一千一百六十二人。日本每方英里（合鄉城面積而言）也只有二千三百四十九人。至於美國，根據一九三二年農業年鑑計算

，每方英里耕地只有四，七人。英國呢，每方英里耕地亦只有七十人，這同中國比較，是多少一個懸殊的情形。我們不必以印度與日本農業人口密度與我們彷彿自慰，印度是個最窮最弱的英國殖民地，日本呢，陳達先生在他的入口問題上已經警告我們，他說，日本「已經感覺入口壓力，亟謀解決的辦法，但在中國，覺悟到此種壓力的人數尚不多」！

人口密度高的結果怎麼樣呢？第一，人民過一種僅僅足以維持生存的生活，第二，人口品質惡劣。這兩種現象，在中國各地鄉村中都強烈的表現着。這種現象的造成，當然還有其他的勢力，如生產技術的幼稚，知識的低淺，衛生的不講求等等，但假設上述三事都有大大的改進，如人口密度不隨之以減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的希望是很有限的（根本說起來，人口密度與生產技術知識增進等等，都有相互關係的，由生產技術及知識增進可以提高人民生活程度而促成人口密度的減低，但生產技術及知識的增進等，牠本身即多少是有賴於人口密度的減低的：人人只得一杯維持生命的羹湯，那裏還有餘力來談增進知識等等的奢侈玩藝！）。低的生活程度，與不健康的人口，在個人是無幸福可言，在整個民族也是一個惡運，我們單單就

國防來說，現代的戰爭，是靠有訓練的，體質強的，知識高的人民來運用精利的武器，人口衆多是無用的，「九一八」以後種種，已經夠使我們警醒了！

人口過密還可以發生其他不幸的結果，自然給予農民的威脅，如水，旱，蟲害等，有的是可以調適的，有的是不能抗禦的。在農民遇着不能抗禦的自然威脅的時候，要使生活不連帶受重大的威脅，只有靠平時有形與無形財富的蓄積。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何以每旱必災，每水必災，而在其他國家如美國等，則遇着水，遇着旱而不必成災，這其中當然有科學發達與不發達的關係，但中國人口過密，家無「担儲之糧」，人無「剩餘之勞」(Surplus labour)，我想也是其中一個大原因。中國水旱情事太常見了，要使水或旱而成災，耕種技術與人口密度都得要想辦法。

中國鄉村人口密度既然如此高，其所發生的惡果又是如此大，那麼如何去救治這個病呢？有人說，邊遠省份有的是荒地，可以實行移民。這個方子的效力是很有限的，翁文灝先生已經指出西北等省可容納的人口最多只有一千萬人（參看獨立評論第三號第四號），J. Thorp（土壤專家）也說，西北是否有許多地可資殖民很可疑（見所著中

國土壤與人文地理短論），所以我們不必抱太大的希望。此外還有兩個方子，一個是振興工業，一個是節制生育，雖屬老生常談，但在我看來，振興工業可以解決中國鄉村人口問題的一部分，節制生育則是解決中國鄉村人口問題的最後武器。

我們只要看看中國同別的國家的都市與鄉村人口的比例，就可以知道中國鄉村人口可以移居一部於都市。美國的農業人口只佔全人口的四分之一，英國鄉村人口與都市人口的比例為二十比八十，若以農業人口來計算，成數當更小。至於中國呢，恰成一個相反，農業人口約佔全人口四分之三。人家都市人口之多與鄉村人口之少，不是本來就是如此的，讀經濟史的人都可以知道在工業革命期間鄉村人口是如何大批的流入於都市。關於這一點，有許多做鄉村工作的人，看見鄉村人口的外流，引為莫大的憂慮，這大可以不必。固然外流的人口，大半都是破產的人們，但這些人如其擠在鄉村，不如在都市中謀一個職業。別的國家還在獎勵勞動的流動哩。此外，也許還有鄉村社會學者要贊美鄉村人口如何如何比都市好，不應該聽其流向污濁之區。我以為現在中國人口問題是一個最起碼的生存問題，都市與鄉村人口的優劣，現在還不夠資格談。最後，

獨立評論 第一三四號 鄉村人口問題

做鄉村工作的人也許看了歐美國家近年來歸農的運動，以為中國不應該逆着方向走。其實歸農運動的當否，現在還是一個爭執，許多農業經濟學者以為這個運動在生產效率上講是站不住的。而況中國與外國農業工業的情形大大不同呢！所以中國鄉村人口朝都市移動是無可非議的，所困難的是中國大工業發達的可能性如何。這一個問題本文不能討論，不過我相信惡劣的命運末嘗不可以人力戰勝，中國工業的前途，亦看國人的努力如何耳。工業與農業是互相依輔的，吳景超先生的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論（見獨立評論第一一八號），在解決農村人口上更具有重要的意義。

都市所能吸收的人口與中國西北部的殖民，在解決鄉村人口問題上，同是一個有限的希望，並且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希望，再談整個中國人口的密度，就嫌太高，不是單單遷移所能解決，因此我們不能不談節制生育這個最後的武器了。中國一向有多福多壽多男子的崇拜——鄉村特別厲害，所以早婚與生育衆多的特點，在世界各國除印度外，就要算中國了。河北省南部，男子十二三歲結婚，並不是一件希罕的事。他們的打算，是早早娶一個媳婦回來，家裏可以多一個人勞作。其實媳婦勞作的結果，是否夠她食用消費，很成問題（國人不能勞作效率的增加上着

想，而從勞作人數上打算，實在是一個大大的錯誤。至於過幾年生下一大羣小孩，更是不用說了。所以在鄉村中應該從戒除早婚與節制生育兩方面着手。早婚與多生育，是國人的傳統觀念，改變傳統觀念，比改變任何事都難，而況生育節制還牽連方法上的問題，這兩件事在鄉村中進行所遇的困難，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不過一件事如果在解決某一問題上是必要的，其所遇的困難，也只有教我們加多努力吧了。我以為現在政府及所有鄉村工作機關，都應該竭力，至少是與其他工作並重的，宣傳及推行戒除早婚與節制生育這兩件事。我在定縣鄉村工作討論會中曾建議鄉村合作社訂立共同信條以戒除早婚與節制生育兩事為其信條之一，曾承會中諸先生採納參攷。我以為合作社在鄉村中已經散布相當的廣，這種散布今後也是一天天的在

增加，鄉村合作社本來就帶有很多教育的意味的，很可以利用這種組織來宣傳並推廣戒除早婚與節制生育。我在這裏特別把這件事重新提起，是希望戒除早婚與節制生育能夠很輕易的在鄉村中及早推行起來。

最後我願借 J. Trap 先生的話來結束這篇文章，他說：

「中國的「福地」，在繁殖人口的精細與忍耐勞作之下，對於其子孫的綿延，確實是盡了一種偉大的努力。我們很想看一看將來，五千年以後，這塊土地有什麼食料可以供養她的子孫，她的子孫將用何種努力使這塊土地能夠維持他們。」

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棄文就武

知 堂

我是江南水師出身的。我學海軍還未畢業得到把總銜的時候便被派往日本留學，但是在管輪班裏住過六個年頭，比我以後所住的任何學校為久，所以在我沒有專門職業的專門中，計算起來還要算是海軍。歷來海軍部中有我的

好些老師，同學少年也多不賤，部長司長都有過，科長艦長更不必說，有的還已成爲烈士，如在青島被張宗昌所殺害的前渤海艦隊司令吳椒如君，便是我的同班老友，大家叫他作書店老板的。我自己有過一個時候想弄文字，不但

裏面而且還喜歡，差不多開了一間稻香村的文學小館，一混幾年，不惑之年餘焉已至，忽然覺得不懂文學，赶快下區歇業，預備棄文就武。可是不相干，這文人的名號好像同總長大帥一樣，在下野之後也還是粘在頭上，不容易能夠或者是肯掣下來的。我的當然不是我而是人家不肯讓我掣掉。似乎文人必定是終身的職務，而其職務則是聽權威的分付去做賦得的什麼文學。我的棄文於是大犯其罪，被一班維新的朋友從年頭直罵到年尾，現在是民國二十三年的年終了，我想該不該來清算一下。仔細想過，還是決定拉倒。第一，人家以為我不去跟着吶喊，他們的大事業便不能成，那是太看得起我，正如說斯人不出如蒼生何，我豈敢當，更何敢生氣？第二，這罵於我有什麼害處？至多影響着我的幾本書的銷路，一季少收點板稅。爲了這點利益去爭鬧，未免太是商賈氣了。第三，這罵於人家有什麼好處？至少可以充好些雜誌的材料，賣點稿費。這事於人有利，我爲什麼不贊成呢。沒有一層，明季的情形已經夠慘了，何必多扮一個幾社社人去湊熱鬧。總之，我早走出文壇來了，還管這文壇的甚鳥？老實說，我對於文事真是沒有什麼興趣，可以不談了，還不如翻過來談武備吧。

且慢，文事不好談，武備難道是很容易談的麼？我知

道這是不然。北京從前到處的茶樓酒館貼過英談國事的紙條，關於武備固然不見明文，似乎沒有禁令，但是軍機何等重要，豈可妄談，況且這又豈非即國事的一部分乎？即使如日本軍部前回的發布小冊子，要使人民都知道國防的緊要，那也是在在上者要說的話，人民怎麼開得口來，只有代表人民替他們作喉舌的議員老並與新聞記者大人們纔有說話的分，可是他們照例還是說在上者的話，說了還如不說，或者還不如不說。我半路出了家，沒有能夠鑽到軍部裏去，議員在中國是沒有，就是有我我也掣不出這筆本錢，記者又是不會當，不敢當。很可惜我那時不會接受這件事：張大元帥的時代，官方要辦一種關於海軍的月刊，部裏的一個同班老友介紹別一位來訪我，要我擔任編輯。其時大元帥部下接收北京大學，改組爲京師大學之一部，我與二三友人被趕了出來，正是在野的時候，老同學保存我當這差使，實在非常感激，可是也實在覺得自己并不來，很難爲情地辭謝了。假如我辦了那個月刊，現在便有說話的地方，然而事在七八年之前，便是怎麼後悔也都來不及了。

其實我所要說或能說的話本來也是很普通的，或者未必有什麼逆碍，也未必有登專門刊物的資格。這大抵是普

通市民無論已登記或未登記的都想得到，只是沒有工夫來說，我們雖然也並不怎麼有閑，却在以前養成了一種忙中說閑話的習慣，所以來代為說出罷了。我的意思第一是想問問對於日前英日美的海軍會議我國應作何感想？日本因為不服五與三的比例把會議幾乎鬧決裂了，中國是怎樣一個比例，五與零還是三與零呢？其次我想先問問海軍當局，——陳先生是我的老同學，可惜現在告病了，再請教別的軍事專家，現在要同外國打仗，沒有海軍是不是也可以？據我妄想，假如兩國相爭，到得一國的海軍殲滅了，敵艦可以來靠岸的時候，似乎該是講和了罷？不但甲辰的日俄之戰如此，就是甲午的中日之戰也是如此。中國甲午以來至於甲戌這四十年間便一直只保有講和狀態的海軍，此是明顯的事實無庸諱言，蓋這四十年來的政治實以不同外國打仗為基礎而進行的，到了今日這個情形恐怕還沒有變吧？在別人——不，就是在自己以前也如此，只好講和的狀況之下，現今要開始戰爭，如是可能，那是否近於奇蹟？本來政府未曾對人民表示過，將來是否要與外國或預料與那一國打仗，我們人民也不必多疑以自取煩惱。但是我看報章上常有代表輿論的主筆做社論，政界要人對人談話，多說一九三六年的中國怎樣怎樣，這就使人民想起幾

個問題，想問一下，便是打不打，同誰打，怎麼打？頭兩個屬於軍機秘密，大約不好問吧，末了一個似乎不妨請教，却也很重要，因為必須先決定了沒有海軍也可以打，那纔能說到打誰或打不打。有些本來是公開的秘密我想為政者也可以就公開了，不必再當作什麼秘密，反使得人民懷疑，不信任。論語十九，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宋信則以為厲己也。現在政府正在崇聖尊經，我願以下子的這句話奉獻。

未了我想關於軍事訓練說一兩句話。我於教育是外行，並不想說軍事訓練對於中小學學業的妨害，那去問校長教員們都知道，我只說學校裏的軍訓之無意義。這軍事訓練在日本是有意義的，日本是徵兵制，青年總得去當兵，不過從前在學時期可以「猶豫」，現在則即就學校加以訓練，實即移槍就教法耳。中國學生大學畢業，非去做各種的官也得充當教書匠，失業即未得業者往學術諮詢處註冊，大約沒有百分之一去入伍吧。那麼這多少年月的訓練至少也總是白費。再說南邊幾處的訓練壯丁，用意與待遇未始不好，然而有些農民寧願逃亡，流落在外作苦工，不肯在鄉訓練幾個月，仍有工資可掙，何也，民未信也。游定縣農村，村長曰全村戶數幾阿，但官廳記載則數更少，因

種種的支離溷濁以戶口計，不能確也，此亦是未備之例。

說到農村，鄙人對於此亦全是門外漢也，多談恐有誤，我

的閒話可以就此打住了。

民國廿三年，冬至日。

蘇俄旅行記（十二）

丁文江

圖喇——莫斯科盆地

去莫斯科以前

我九月六日晚上乘「牛奶婦」火車從華士克列生士克回到莫斯科。臨別和許羅哥夫約好第二天早上見面。到了第二天我一早起來等他，一直等到十二點，不見他的踪跡。中午我到中國大使館吃了飯又立刻趕回旅館來等。等到天黑依然是沒有消息。我費了許多手續纔打通了電話和地質探鑽聯合局說話。那知許先生一天沒有到公事房。又從電話簿上找出了「許羅哥夫」的名字，逐一的打電話去探問，都不是我要找的那一位。如是呆等，笨打電話，消磨了一天！

吃了晚飯很無聊就去觀劇。所演的是「歐進，奧余金」*Engin Orugin*——是蔡哥夫斯可荃 *Tshalkowsky* 的名義。劇本的事跡是極端的封建式的：兩個男人到一個大地主家裏去。因為爭愛女公子而發生了決鬥。一個被

殺，一個逃避。許多年以後女公子已經嫁了一位闊人，又和殺人的那一位見面。她想起舊情，然而又沒有勇氣去接受他的戀愛。觀劇的羣衆和莫斯科一樣。他們對於這種封建式的舊劇，也是一樣的欣賞。我更覺得蘇俄美術和文學的革命距成功還遠，要不然何以還須靠這種一百年前的劇本來做普羅羣衆的娛樂？

出了劇場已經夜半，走到旅館的飯廳去吃「宵夜」。方始知道飯廳上是通夜有跳舞的。跳舞的客人除去極少數的外國人以外，都是三十以內的青年男女。裝飾極其不一致：少數的也有穿得整齊的；多數却是很簡陋——尤其是男人。跳舞場的規矩和別國一樣；就是要購買飲食。我住的首都旅館 *Hotel Metropol* 是莫斯科第二個大旅館，飲食費得很貴。跳舞的人一夜的享樂大概要消耗他月薪的相當的一部分，但是舞客仍然是不少。跳舞的音樂是美國式的「爵士」！使得我感覺極端反資本主義的蘇俄，許多地方，

不知不覺的受了美國式的，極端資本主義的文化的影響。

不但音樂如此，就是旅館的侍者，組織等等，也都模仿資本主義的產物。立在門口的帶的是鑲金邊的帽子，穿的是鑲金線的衣裳。遠遠望去，好像是一位海軍大將。飯廳上的侍者，男的是白領結，硬白襯衫，黑燕尾服；女的是白絲開口衫，黑呢裙子，長統絲襪，高跟鞋。在列寧格勒，伺候我吃飯的女侍者是一頭純金色的頭髮。我指給許羅哥夫看道：「純金色頭髮在蘇俄不多見。這一位許是北方來的嗎？」他鼻子裏哼一口氣道：「假的！藥水染的！」「染頭髮很費幾個錢的。做侍女的染得起嗎？」「那可被你問着了。你難道不知道？女人染頭髮，比吃飯還要緊！」歇了幾天，這位侍女的頭髮果然變做棕色的！

八日的早上我自己到地質探礦聯合局去見奴維哥夫，方纔知道許先生是生了病了。奴維哥夫于是另派了一位布拉哥佛林(Bragovin) 做我的翻譯。布先生是一位名醫的兒子，學語言富有天才。除去了英法德三國語言之外，他還通波斯語。以後我們同行了將近一個月變為極熟的朋友。

亞布羅哥夫先生也在局裏。我告訴他，我沒有南下之前，很想有機會看看莫斯科盆地的地質和礦產。于是約好

了明天同到圖喇(Tula)去，參觀煤田與鐵廠。後天回到

莫斯科來作最後的接洽，然後向南到巴庫去。

從莫斯科到圖喇

圖喇從前是個省會，在莫斯科向南的鐵道上。本來可以坐火車去的。因為火車的鐘點不方便，于是我又向顏大使借了一輛汽車。第二天早上九點鐘從莫斯科出發。同行除布拉哥佛林與亞布羅哥夫之外還有伊華努華小姐。從莫斯科到圖喇是自古以來的大路，比前幾天到華士克列生士克的路好得多了。從莫斯科向南四十公里到波多爾士克(Podark) 路最好；原來的石塊路，大部分已經改為柏油，改好了的當然是極其平坦，汽車每點鐘可以走七十公里。但是一到了石塊上，就慢到三十公里左右。過了波多爾士克，是普通的石子路，因為這裏有石礦，石子容易採取。這種比石塊路更容易壞。修理不動，汽車就很不好走。大使館的汽車是「比由伊克」(Bick) 牌，本來是很好的，日久失修，走了壞路，機管就出了毛病。從波多爾士克到塞爾甫哥夫(Cerkulov) 四十五公里，車壞了兩次；第一次停了四十五分，第二次二十分，所以從莫斯科到塞爾甫哥夫九十五公里，九點出發，一點一刻方始走到——平均一小時不過三十公里左右。塞爾甫哥夫是一個大村子。村南頭是奧卡河(Oka)，河上有一座大鋼橋。我們

過了橋找到了合作社 Kolkhoz 的茶室，就在那裏吃午飯。

茶室是長方的一大間。右邊是一個戲台式的講台；台下有許多木板凳，台上貼著許多標語，掛著許多偉人的畫像，是合作社開會的地方。左邊和中間放著幾張木桌和板凳，是社員喝茶的地方。中間的裏邊，就是茶爐，茶以外還有熱牛奶出賣。中間有一後門，通著一個空院子。院裏亂七八糟的堆着穀草，牛馬糞，農具等等。男女的毛腿也都在這院裏。茶室地下却有地板。牆壁掉漆污穢的程度和中國南方鄉下的茶館相差不多。我們向茶室買了兩大桶熱牛奶，把帶來的麵包，魚肉，魚子拿了出來飽餐了一頓。一直到兩點鐘方纔出發。

從塞爾市哥夫到圖喇不過八十三公里。路初起很壞，走近圖喇，逐漸的變好起來——車快的時候也可以走到七

十公里一小時。不幸快到圖喇的時候輪子的皮帶破了，又耽擱了半點多鐘，所以到圖喇的時候已經將近五點了。

歐洲蘇俄的天然區域可分為三種：靠北冰洋的是蘇苔帶 (Arctic Tundra)，在列寧格拉得的緯度以北，中間是森林區，莫斯科和列寧格拉得都在這區裏面，南面是草地 (Steppe)，蘇俄的草地有一個特點，就是牠的土是黑色的，耕種起來，不必用肥料的。這是著名的黑土。西北利亞和東三省的北部也都有牠。圖喇區在草地和森林交界的地方。從莫斯科來，沒有耕種的地方，往往都有森林。走近圖喇，樹木就漸漸的少起來。同時土色漸漸變黑。

圖喇原來是個省會。街道雖是石塊舖的，却是很寬大。電燈以外，還有電車。我們因為時間晚了，把行李卸在一家旅館，沒有下車，就到莫斯科區煤礦管理局，接洽參觀的事去。

中國的政制問題

吳景超

去年這個時候，關於中國政制的問題，曾引起輿論界很熱烈的討論，參加的人雖然很多，似乎並沒有得到一致

的結論。今年這個問題，又因汪蔣兩先生的通電，重新引

起大家的注意。我對於這個問題，覺得應該分作三方面討論：

第一，中國現在實行的是一種什麼政治？是獨裁政治

？還是民主政治？這是一個事實的問題。

第二，我們願意要有一種什麼政治？這是一個價值的問題。

第三，怎麼就可以達到我們願意要有的政治？這是一個技術上的問題。

我覺得總要把這三點分清，然後討論時彼此才能互相了解，不致誤會。關於第一點，我以為大家對於事實的認識，應當是一致的，但從近來所發表的言論看來，似乎現實雖只一個，而各人的看法却有不同。我個人的看法，以為中國現在的政治，是一黨獨裁的政治，而在這一黨獨裁的政治中，少數的領袖，佔有很大的勢力。我這樣說法，請讀者不要誤會我把中國的政治，與意俄的政治歸於一類，因為在一黨獨裁這一點上，這幾個雖然相同，而在若干具體的表現上，這三國的政治，是有很大差異的。我說中國現在的政治是一黨獨裁，因為現在政治中內政外交諸大問題，只有一黨的黨員，可以過問，別人是沒有這種權利的。關於此點，不但在野的人，有許多是這樣看法，就是在朝的人，也是同意的。

關於第二點，因為包含一個價值問題，所以意見就紛歧了。去年我曾寫了一篇革命與建國的文章（獨立第八十

四期）裏面提到除却武力統一的方式外，我們看不出還有什麼別的方式，可以完成統一的使命，於是有人以為我是贊成獨裁的。其實這種推測是錯誤的。我在那篇文章裏，討論的是一個事實的問題，或技術問題，而贊成獨裁與否，乃是一個價值問題，決不可混為一談的。關於獨裁政治，與民主政治的選擇，我與胡適之先生的意見是相同的，我們贊成民主政治。我個人贊成民主政治的理由是很簡單的。第一，民主政治是理智的政治，誰能夠說服大眾，誰就可以當權。第二，民主政治是自由的政治，我們的主張，無論是贊成政府，或反對政府，都有充分發表的機會。第三，民主政治是和平的政治，假如我們對於政府不滿意，可以提出我們的主張來，以求民衆的擁護，假如民衆贊成我們，我們便可上台，不必流血，不必革命。第四，民主政治是大眾的政治，凡是公民，都有參政的權利與義務，民衆與政治，可以打成一片，沒有統治者與被治者的分別。因為民主政治有這四種特點，所以我個人如在各種政治中可以自由選擇，我一定選擇民主政治的。不過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這是一個價值問題，好像羅素會說過，凡是價值問題，都沒有絕對標準的。我們只能提出我們以為是好的，希望別人都能與我們同意，但別人如不同意時，我

們也沒有方法，可以證明我們的價值，是至高無上的。

但是據我的觀察，中國的智識階級，多數是偏向民主政治的，就是國民黨在理論上，也是贊成民主政治，不過覺得實行民主政治還沒有到時候就是了。所以我們所希望的民主政治，前途是沒有阻礙的，用不着像法國那樣革命方可達到的。不過革命的工作，雖然可以避免；而和平的工作，亟待努力的，真是不可勝舉。在這些和平的工作沒有完成的時候，民主政治是無法實現的。這些和平的工作是什麼？便是我上面所說的第三個問題，技術上的問題。

民主政治，在一個國家裏，能否推行，要看這個國家是否具備下列五個條件：第一，便是政黨的組織，但政黨的數目，一定要在一個以上。第二，是自由的討論，對於國家大事，不但要有發表意見的自由，而且還有人肯來利用這種自由。對於國事漠不關心或不知關心的人民，決不會產生民主政治的。第三，是普選的權利，假如選舉權只在少數人的手裏，如英國在十九世紀初葉的情形，只可稱為階級政治，不能稱為民主政治。第四，是多數黨執政。民衆選舉的結果，誰得着民衆的擁護，誰便掌握政權。少數黨只可在旁批評，只可設法培植力量，以求下次勝利。但決不可搗亂，不可拆台。第五，是頻屢的選舉，每隔若

千年，立法員及主要的行政首領，要讓民衆重行選舉一次，以示民心的向背。這五個條件，在今日的中國，或因法律上有阻礙，或因民衆的程度不夠，或因新習慣還未養成，並沒有充分實現。在條件還未完備的時候，便要把在英美實行而有成效的民主政治，硬搬到中國來，結果是一定重蹈民國初年的覆轍，使民衆對於民主政治更加一層的厭惡而已。

所以凡是贊成民主政治的人，都應該努力，在中國的環境中，培植我上面所說的民主政治的條件，這是和平的——同時却是很吃力的——工作，大部份可以用教育的方式完成的。等到條件完備之後，再行民主政治，便如水到渠成，毫不費力了。

由于以上的分析，所以我敢大膽的推測，在最近的將來，中國還擺脫不了一黨專政的局面，但因現在專政的黨以及國內的智識階級，在價值上是贊成民主政治的，所以中國將來也許可以和平的走上民主政治的路。不過民主政治的條件，在今日的中國，是並沒有具備的，所以將來民主政治在中國是否能夠成功，便要看最近的十幾年或幾年內，我們對於預備的工作，是否做得完滿而定了。

編輯後記

編者

△陳之邁先生在「統一」的基礎」一文裏，指出現代經濟制度的發展，是國家統一最主要的基礎。我們不禁要問：陳先生所說的現代經濟制度，在一個未統一的國家，是否可以發展？陳先生所舉的兩個例子，德國與美國，其經濟制度的現代化，乃是統一以後才實現的，此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顧毓琇先生是清華大學工學院的院長，他在「學術與救國」中所提出的問題，是在國難中大家常想到的。△巫寶三先生是北平社會調查所的研究員，在本刊九

十六期，他曾發表過一篇「定縣主義論」。

△知堂先生，是大家都知道的，用不着介紹。他在「獨立」兩周年紀念時，送來一份禮物；現在「獨立」過年了，他又送來一份厚禮。但我們是不知足的，願意把以前對周先生說過的話再說一遍：「我們盼望他常常增點結果給這個傻小子，不要等到過年過節才送禮。」

△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討論，上期曾登了三篇文章。這一期中，我們又轉載一篇討論同一問題的論文。

獨立評論合訂本

- 第一冊（第一至第二五號）
- 第二冊（第二六至五十五號）
- 第三冊（第五一至七五號）
- 第四冊（第七六至一百號）

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掛號照加）						
本報每日三大張，內容商每日「祖論」及「中外新聞」外	育界」「社會新聞」「外國通訊」「經濟界」「教育界」「計新聞	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	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中外唯一之	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真直，其發種種，不可殫述。	目價報定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歐地）每月二元二角（香港）每月二元九角（新加坡）每月四元一角

北平晨報